

“和”文化视域下华夷观念的演变

杨朝晖 周海霞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河北省、石家庄, 050091)

摘要: 华夷观念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的演变历程, 深刻体现了中华“和”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张力。“和”文化以“和而不同”为认知原则、“和实生物”为生成机制、“致中和”为价值追求, 构成了华夷观念演变的思想底色。本文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心, 从政治联姻、文化整合、制度变革、忧患意识与仁勇精神等维度, 系统考察华夷观念从差异区隔到融合一体的历史进程, 揭示“和”文化如何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在冲突中推动融合, 最终促成“华夷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表明, 华夷观念的演变并非简单的同化过程, 而是在“和”文化精神指引下的多元共生与辩证融合, 这一历史经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和”文化; 华夷观念; 演变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华夷观念经历了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并非单向的文化同化, 而是中华“和”文化精神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具体展开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 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 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以“和”文化为分析框架审视华夷观念的演变, 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形成的内在思想机制。

(二) 研究视角与方法

本文以“和”文化为理论视角, 运用历史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 聚焦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华夷观念转型的关键阶段, 从政治联姻、文化整合、变革精神、忧患意识、价值认同等维度, 分析“和”文化如何贯穿并塑造华夷观念的演变进程。

(三) “和”文化的核心内涵

“和”文化源远流长, 其核心内涵可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3]其一, “和而不同”——以承认差异性为前提的包容精神。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4]其二, “和实生物”——差异性和多样性构成事物生成的动力机制。《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生之。”^[5]其三, “致中和”——对平衡、适度与和谐的至高追求。《礼记·中庸》云: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

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和”文化的理论骨架，也为其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和”文化视域下的观念转型

（一）西周时期的“夷夏之辨”与“和”的雏形

在西周时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催生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左传》《淮南子》等典籍中保留了对周边民族带有歧视性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华夏在文化与族群层面的优越意识。西周推行制礼作乐之后，文化日臻完善，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将文化落后或不遵循礼仪规范的民族称为蛮、夷、戎、狄。

西周实施的宗法分封制客观上促进了夷夏民族间的人口迁徙与往来交流，^[7]推动了相互融合与渗透。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朴素的“和”的智慧——通过制度设计将差异性的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之中。西周至春秋时期，王室和诸侯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已体现出“和而不同”的治理思维。周成王将弟弟叔虞封于唐国故地时，告诫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8]即在保持夏政主体框架的同时，尊重戎人的传统习惯与法律。这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6]的治理理念，正是“和”文化在政治实践中的早期表达。

（二）春秋战国：“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交往的日益深入，“夷夏之辨”开始向“华夷一体”转变。^[9-10]这一转型与当时“和”文化的理论自觉密切相关。

首先，诸子百家对“和”的阐释为华夷观念的转变提供了理论资源。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和”的理念，使之从朴素的实践智慧升华为系统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知——既然宇宙万物“和实生物”、人类社会“和为贵”，那么不同民族之间也应当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共存共荣。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促使华夷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列国争霸使各国纷纷与周边民族结盟或联姻，华夷之间的实际交往日益频繁。晋国长期处于戎狄环绕之中，“夷夏之防”观念最先受到冲击，晋国贵族和国君率先打破“华戎不婚”的传统，开创了华夷通婚的先河。

再次，文化标准取代血缘标准成为区分华夷的核心尺度。孔子强调大一统，在这一框架下，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11]这种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分华夷的理念，为“和”文化在民族关系中的运用打开了空间。它意味着任何族群都可以通过文化认同融入“华夏”大家庭，体现了“和”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三、政治联姻：“和”文化在民族交往中的实践机制

（一）“和戎”方略与联姻的政治智慧

政治联姻是春秋时期推动华夷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机制，也是“和”文化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典型实践。所谓“和戎”，就是以和平方式处理与戎狄的关系，联姻则是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晋悼公时期，大臣魏绛力主“和戎”政策，他劝谏晋悼公：“和戎狄，国之福也。”^[8]晋悼公采纳其建议，施行“和戎”政策，“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8]魏绛以音乐之和比喻民族关系之和，将“和”的理念从音乐美学领域延伸到政治实践领域，充分体现了“和”文化在民族治理中的运用。

（二）联姻对“和而不同”原则的具体践行

春秋时期的政治联姻集中发生在晋、楚、秦、齐四大强国。这四国地处弧形中间地带，与中原地带及戎狄蛮夷接壤，是华夷交往的前沿区域。晋献公率先打破“华戎不婚”的传统，开华夷通婚之先河。晋文公本人即为戎狄与华夏的混血，他又娶狄女为妻，此后晋国贵族及世家大族与戎狄联姻不断。

政治联姻对“和而不同”原则的践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尊重差异。联姻并非要消灭民族差异，而是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建立血缘纽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其二，寻求统一。通过婚姻关系建立政治联盟，在差异性的民族之间构筑共同利益基础。其三，互惠共生。联姻是一种双向交流，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在联姻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共同丰富。

（三）联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奠基作用

政治联姻不仅加强了中原诸国与周边戎狄蛮夷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实现了民族间的血缘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生物学和文化学基础。

联姻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婚姻观念，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观念逐渐松动。^[8]联姻双方通过“亲迎”“纳币”等礼仪活动加强人员往来与文化沟通。更重要的是，联姻之后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为更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和”文化的角度看，政治联姻是“和”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在冲突中推动融合的生动实践。它不以消灭差异为目标，而是通过建立新型关系使差异性的族群能够共生、共荣、共发展。

四、文化整合：“和实生物”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集中展现

（一）百家争鸣与“和而不同”的思想格局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和实生物”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展现。^[12]司马谈将战国百家之学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13]刘歆则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14]诸家从不同角度，以各异方式探索自然、社会、历史、人性及道德本质，提出了众多治国安民、富国强兵的良策。

孔子主张富而教之，老子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墨子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孟子推崇王道与仁政，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秉持人定胜天，韩非子强调法、术、势。这些学说虽各有侧重，甚至相互批判，却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思想生态。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这正是“和”文化在思想领域的最高境界。

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因为“和”文化提供了包容差异、鼓励创新的精神土壤。它不追求思想的单一化，而是在多元碰撞中激发出创制精神。诸家学说虽并非尽善尽美，但都展现出开放包容、积极创制的精神，立论有理有据，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景象。

（二）变法图强中“和”的辩证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同样体现了“和”文化的辩证精神。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改革、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齐国的邹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一系列举措纷纷登场。这些变法运动虽在具体内容、深度广度以及推行力度上各有千秋，但都蕴含着相近的改革精神。它们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影响到全体社会成员，不仅改变了社会形态，还重塑了战国七雄的力量对比。变法图强本身就是一种“和”的实践——在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寻求新的平衡点，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新的有序状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13]这一改革主动吸收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军事文化，打破“华夷之辨”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壁垒。它表明“和”文化不仅承认差异，更能够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实现更高层级的融合与发展。

（三）文化典籍编纂与“和”文化精神的历史凝结

春秋战国时期在继承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文化整合，涌现出众多历史文化典籍。^[15]这些典籍以及相关历史活动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历经岁月洗礼而经久不衰，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之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些典籍的编纂本身就是一种“和”的实践——将不同地区、不同学派、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汇聚为一体，去粗取精、融会贯通。例如，《诗经》收录了来自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诗歌，既有“周颂”“大雅”，也有“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展现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壮阔画卷。这些典籍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纽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忧患意识与仁勇精神：“和”文化的深层动力

（一）忧患意识作为“和”文化的精神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变迁剧烈，有识之士的思想中普遍萌生出“忧国忧民、忧社稷”的忧患意识，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把居安思危视为治国的重要原则，他告诫晋悼公“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8]孔子也对不修道德、不讲学问引发的社会问题深感忧虑，提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4]

到了战国时期，忧患意识被统称为“忧社稷”，并被归纳为五种类型：“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战国策·楚策一》）。^[16]忧患意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的主流社会心理和意识。

从“和”文化的角度审视，忧患意识与“和”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不是静态的和谐，而是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应对挑战、化解矛盾的辩证过程。忧患意识恰恰是对“和”的脆弱性的警觉——人们意识到“和”需要维系、需要捍卫，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与分裂。正是这种忧患意识，驱使着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有识之士在艰难的时局中努力推行学说、践行主张，他们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更高层次之“和”的实践。

（二）“仁勇”精神与“和”的价值坚守

在春秋战国时期，推行和实践任何思想学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需要具备刚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孔子强调“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4]并将“仁勇”从精神和行动两个层面进行了阐释。在精神层面，志士仁人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气概；^[4]在行动层面，要见义勇为，临危不惧。

孔子的“仁勇”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为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7]（《孟子·告子上》）魏国的唐雎与秦

王政交涉安陵事宜时的慷慨陈词，^[16]以及荆轲刺秦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3]的悲歌，都是这种“舍生取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仁勇”与“和”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真正的“和”恰恰需要勇气来坚守。孔子在夹谷之会中怒斥齐景公，从容应对“畏于匡”、桓魋追杀和“在陈绝粮”等困境，堪称大勇与“和”完美结合的范例。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谋求和解，在维护尊严的前提下推动合作，这正是“和而不同”精神的实践表达。

（三）从“和”的视角重审“舍生取义”

从“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舍生取义”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舍生取义”的深层逻辑是个体生命固然珍贵，但维持族群、社稷的和谐秩序与道义原则更为重要。这种价值排序不是对生命的轻贱，而是对更高层次之“和”的追求——当个体之“和”（生命存续）与天下之大“和”（道义秩序）发生冲突时，舍小和而取大和。

这种精神在民族关系领域有着特殊的意义。历代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够超越狭隘的族群认同，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惜牺牲，其精神根源正在于此。“舍生取义”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外部挑战时能够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在动力。

六、华夷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的历史成果

（一）“华夷一体”的文化认同机制

春秋战国时期，在继承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华夷各族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华夷一体”的格局^[18]。这一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和”文化提供的文化认同机制。

首先，“和”文化提供了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分族群的认知框架。只要接受华夏礼乐文明，任何族群都可以被视为“华夏”的一员。反之，如果背离华夏文化，即便是华夏血统也可能被视为“夷狄”。这种文化主义的民族观为不同族群融入华夏大家庭打开了大门。

其次，“和”文化提供了“求同存异”的融合原则。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共同认同于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认同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建立共同的价值底线和文化归属感。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认同机制，使各民族在保持多元性的同时能够凝聚为一体。

再次，“和”文化提供了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家”的辩证转换路径。春秋时期，

孔子以“有教无类”^[4]的精神打破贵族对礼乐文化的垄断，将教化开放给所有人群，包括周边民族。这不仅促进了华夏文化的传播，也为各民族提供了通过文化学习获得华夏身份的可能。

（二）从政治联姻到社会融合的“和”的扩展

政治联姻最初是上层统治者的政治策略，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通过联姻建立的血缘关系，使华夷之间的界限在生理层面上被打破。晋文公作为戎狄与华夏的混血，其个人身份本身就体现了华夷融合的成果。其后，晋国贵族及世家大族与戎狄的联姻不断，这种趋势逐渐从上层社会扩展到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融合。^[19]

这种从政治到社会、从上层到底层的“和”的扩展，体现了“和”文化强大的渗透力和整合力。政治联姻最初是出于“和戎”的政策需要，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内化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当华夷通婚成为普遍现象，当华夷混血不再被视为异类，“华夷一体”就不再只是政治口号，而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20]

（三）“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意义

“华夷一体”格局的形成，为日后中国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格局的形成，不是通过强制同化，而是通过“和”文化精神引导下的自然融合。多元特色文化如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

从“和”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各民族在处理彼此关系时能够遵循“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这种文化基因使中国在历史长河中能够克服分裂，实现统一；能够超越冲突，走向融合。历史上即使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和”文化也始终作为一种理想指向，引导着各民族朝着“华夷一体”的方向发展。

七、“和”文化的当代启示

（一）从历史经验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华夷观念的演变历程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近代以来的“建构”，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生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政治联姻、文化整合、思想交融等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已经初具雏形。“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提供了交融的理念、融合的途径和认同的标准。

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重要启示。其一，要坚持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将各民族凝聚于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之下。其二，要坚持“和而不同”的

原则，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其三，要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和”文化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当代价值

“和”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在当代民族关系治理中仍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1]这一理念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运用，就是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体而言，“和而不同”对应着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和实生物”对应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社会发展的规律；“致中和”对应着在民族工作中保持平衡与协调发展。这些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和”文化

“和”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1]的理念，正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整体性的宇宙观提醒我们，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将“和”文化的生态智慧融入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也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绿色家园。

八、结论

华夷观念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的演变，深刻体现了中华“和”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内在逻辑。“和而不同”提供了在差异中寻求统一的认知原则，“和实生物”揭示了多元化作为发展动力的生成机制，“致中和”表达了对平衡与和谐的至高追求。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联姻、百家争鸣、变法图强、忧患意识与仁勇精神等历史实践，共同构成了“和”文化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具体展开。

由此可见，“华夷一体”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同化过程，而是在“和”文化精神指引下的多元共生与辩证融合。它以文化认同而非血缘认同为纽带，以“和而不同”为融合原则，以“致中和”为价值追求，最终实现了各族群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和”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加深厚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16.
-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1-19.
- [3]张立文.和合学——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5]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 沈长云,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6]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7]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第一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 [9]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0]顾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1]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1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1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 [16]范祥雍.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18]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4.
- [19]林惠祥.中国民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20]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1).

The Evolution of the Hua–Yi Con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e of “He”

Yang Zhaoxue Zhou Haixia

(Hebe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City, Hebei Province, 050091)

Abstract: The Hua–Yi (Huaxia–Yi) conception is central to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on ethnic relations. Its evolution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i and Xia" to the "integration of Hua and Yi" deeply reflect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piritual ten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He”, which takes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s its cognitive principle, "harmony generates things" as its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attaining the mean and harmony" as its value pursuit. Focusing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ereby the Hua–Yi conception moved from differentiation to integration, analyzing dimensions such as political intermarriag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sense of vigilance in times of peace, and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and courage. It shows how the culture of harmony sought unity within difference and promoted integration through conflict, ultimately bringing about the pattern of Hua–Yi integra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is evolution was not a process of simple assimilation but one of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nd dialectical fusion guided by the culture of harmony, offering importa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culture of “He”; Hua–Yi conception; evolution